

大家小说

人物掠影

谁鼓舞了我

全国政协委员 迟子建

编者按：

1月20日，迟子建全新作品《东北故事集》上市。新书上市之后反响热烈，首日便实现加印，当日印数已达10万册。《东北故事集》收录了迟子建近年来创作的三部钩沉东北历史的中短篇小说，地以其不同寻常的历史纵深感，与人的命运感无缝对接，使小说的宽度和厚度大大拓展，呈现出大家风范。为此本刊发表《东北故事集》后记，以飨读者。



迟子建

A面

这是乌镇11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在西栅一家旅馆，我推开阳台古朴的木格子门，“哗”作响中，一池残荷如褪色的年画，映入眼帘。荷花与夏风是神仙眷侣，所以即便是江南，一朵荷花也寻不见了。荷叶多半枯萎，偶尔泛绿的，边缘也是深褐色的，那是太阳燃烧的痕迹，是荷花怒放后的痕迹，是冷风吹打的痕迹，更是看不见的时间悄然走过的痕迹。那已呈现出金属色的莲蓬，就像一颗颗亮闪闪的铜纽扣，还妄想锁住这寸寸流失的生机。

一周以前，我还在飞雪弥漫的黑龙江。今冬的雪不像往年是由初冬的小雪，逐渐演变为隆冬的大雪。刚踏进冬的门楣，雪花就爆了，以气吞山河之势，刷白了北国山河。飞雪漫卷、北风呼号，那是我童年常见的情景，可这些年由于全球气候普遍变暖，难得一见了，所以当它们在2023年的冬天盛装归来，不仅明年待播的庄稼暗喜，人也是欢欣鼓舞的，纷纷走出居室踏雪而行，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与这久别的亲人似的。

2020年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工作岗位变化，写作时间刹那变得碎片化，一度让我非常焦虑。以往我可以心无旁骛地驰骋于小说中，现实世界反而像虚构的；而现在我被结实打回现实，夜里连梦都少了，只能见缝插针进入文学天地。

在政协分管文史工作的这3年，我走了不少省内市县，很多地方年轻时去过，还停留在青春的记忆中。也许是人近黄昏的缘故，重走故地，万千感慨，世界的颜色仿佛覆了一层，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以前似乎是浑噩的，如今却鲜活明媚，像烙印一样漫出地层，闪烁着，跳动着，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霞光。既然难有从容的时间经营长篇，我便尝试用中短篇小说来演绎这些故事。

首篇《喝汤的声音》写于2021年，聚焦的是海兰泡惨案，在虚与实之间，我找到了一个饶人的“摆渡人”，或者说是一个幽灵，来做主讲人。因为确定用短篇承载这个故事，所以写的时候不停地捶打和挤压它，不断地“收”，让一条河瘦身成溪，写完后意犹

未尽，我明白对这样的东北故事的叙述信心建立起来了。2022年我用中篇营造这个系列的第二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讲述徽钦二帝在黑龙江五国城被困的岁月，我运用两件叙事“助推器”，一个是白釉黑花罐，一个是碑桥，前者是根据史料虚构的，后者源于我参观五国城遗址时看到的一块碑，它们曾做过牡丹江大桥的基石，在波涛中不知渡过多少往来的人，我将它们放在那些对徽宗来说风雨如晦的日子，小说的人物因之复活。在“亡灵”镇守的“上半夜”和“下半夜”，每段故事是柔情的，又都是悲凉的。

两篇小说都是由现实进入历史的，这三年处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中，所以引领我们进入故事的现实主人公，仿佛就是我们自己，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无奈，但生活依然静水深流，烟火漫卷。

15年前因《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我来乌镇参加颁奖典礼，也曾住在西栅。那时西栅还有原住民，进出须乘乌篷船。记得也是11月，常见水边的白鹭像跳芭蕾舞的，细脚伶仃地立在水畔，眺望着谁。一早一晚雾气很大，西栅忽隐忽现，看上去就像一幅水墨画。深夜穿行于石巷，总能听到打更的梆声，那么清寂悠远，让人以为身置古刹，归来后我还写过一篇散文《西栅的梆声》。而今的西栅不见原住民，白鹭也不见了，有的是商家和游人。石巷的灯，也不完全是乳黄色的了，那些建筑和石拱桥身披彩灯珠串，霓虹闪烁。除了青砖灰瓦透出本色，与其他城市的夜晚并无二致，让我怀疑记忆中的西栅是

否存在过，也由此怀疑此刻身处江南，能够舒展身姿在阳光如水的早晨，倚着木格子门赏这一池残荷，是在一场虚构中。

B面

这是11月哈尔滨下旬的一个黄昏，雪还在下。

结束了乌镇的行程，又飞至北京开会，一周很快过去了，返回哈尔滨时天气低沉，又要下雪的模样。果然一夜醒来，拉开厚重的窗帘，只见窗外飞雪漫卷，风当起了搬运工，将园田的雪吹得高高低低的，打造成了起伏不定的白色山丘。喜鹊和麻雀无法刨开厚厚的积雪，聚集在白桦树啄树皮，还有的在干枯的花枝上跳来跳去，希冀找到吃的。我赶紧穿了羽绒服，戴好帽子手套，找个盆子盛些小米，出门放在窗前的雪地上，又用铁锹清出一条露出泥土的雪路，因为不是所有的鸟儿，都待见唾手可得的食物。回屋后我发现那只盛米的盆，很快吸引了不少麻雀，但在掘开的雪路上，也跳跃着欢欣鼓舞从冻土中觅食的喜鹊。

关于东北的故事，似乎也离不开这样的风雪天。而我童年听故事，恰好是在漫漫冬夜的火炉旁，外祖母总有讲不完的传奇故事。

这个系列的第三篇小说《碾压甲骨的车轮》，起笔于2022年秋天，跨越了一个冬天，今春才完成初稿。小说的隐形主人公罗振玉，我在20多年前的长篇《伪满洲国》中有涉及，犹记得薄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他的鄙薄。但事实是，不论罗振玉如何，他是一个在收藏和学术上有贡献的人。2019年初冬在大连召开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有一天与张学昕、季进等教授参观声名远播的大云书库，站在罗振玉旧居前，听旅顺博物馆的专家讲述当年罗振玉文物(尤其是甲骨)失散之事，不胜唏嘘。一般我在小说中涉及过的历史人物，罕有激情再度呈现的，但罗振玉是个例外，回来后读过关于罗振玉的一些传记，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之争的文章，我看到了学术的多副面孔，有了用小说接近这段历史的想法，因为文学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素材在脑海中发酵的过程中，一只马车滚滚而来，轰然作响，于是我以悬疑的缺口，让它从历史深处碾入现实。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性的风雪，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歌哭，都让这个文本开始时有点沉重。那期间母亲在我这儿住了三个月，我跟她讲了大致情节，双休日我开足马力写作时，一从小书房出来，她总问我写到哪儿了？每次我都说写到马车要出城了。所以她回乡时没对我说别的，只撂下一句，我可得走了，在这儿太耽误你了，快让马车出城吧！

初稿即将完成时，因为有外出调研任务，初春我率队去了江西和甘肃，无论是参观景德镇的瓷器博物馆，还是在敦煌参观莫高窟，都能联想起罗振玉的收藏和研究，所以小说气的未断，归来顺利作结。我的小说脱稿后，通常会放置一段，然后再修改。早在4月，《收获》的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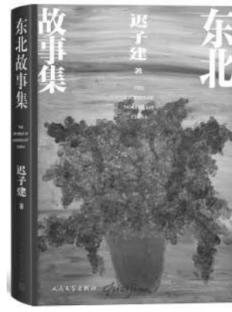
永新就发来短信，说感觉你有作品写好了，不知直觉对不对？我说正在过程中，耐心等待吧。在他的催促下，这篇小说没有修改前的“冷却期”，改后直接发给他，这已是春末了。而且一交稿我就“阳了”，所以躺倒后高烧的那两天，我最庆幸的是好歹把它完成了。

从昨夜到现在，这上天派遣的冬的使者雪花，在大地上演的霓裳羽衣舞没有谢幕的意思。此刻想起我的长篇《群山之巅》的结尾：“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能听见谁的呼唤”，不胜伤感。是啊，在这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中，谁没有过孤独感呢。这部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时，我也踏入60岁的门槛了。60年，我有40年是在小说的岁月中。60年，我有30多年是在怀念已故亲人的日子里，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他们永别得实在太早。一个人的长夜，注定听了更多这世上雨打风吹的声音；一个人的柴米油盐，自然也浸透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楚。所以有人说搜索关于我的词条，会跳出我有几段婚姻这样的问询，我只能苦笑。至于一些标题党的网文，什么迟子建人到五十最通透的话法是什么之类的，这拼凑和罗织的东西也许并无恶意，但与我何干？我可不是中药铺的郎中，哪敢给人开什么药方。

青春一去不回头，白发一来不再去。虽说渐渐走向人生的黄昏，但我对文学热望不减。如果说这世上有一条绳索可以缚住不羁的我，那一定是写作。

除了古典音乐，我还钟爱流行音乐，西城男孩的《你鼓舞了我》就是我喜欢的一首歌。它听上去温暖亲切，令人激情澎湃。弥散其中的爱尔兰风笛声，是闪烁于这首歌的星光，摄人心魄。能够一路走到今天，我特别想感谢鼓舞了我的亲人、友人和读者。当然不仅是我，还有那山岭间深沉的水流，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划过长空的飞鸟，不惧燃烧的太阳，有盈有亏的月亮，踏着泥泞的野鹿，迎风斗雪的苍松，耕田的牛，负重的马，洄游的鱼，等等等等，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美好、不屈和安详，无言地鼓舞了我。

关于东北故事的系列小说，A面之后，就像我在这个飞雪的日子写的后记，会有B面。而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中。



迟子建新作《东北故事集》

冯远征：向文学巨匠致敬

本报记者 杨雪

新年伊始，北京人艺又一部大戏登场——京味儿话剧《正红旗》从1月19日起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一直持续到春节期间。用这部作品贺岁，北京人艺希望与观众一起在剧场里感受一场老北京的历史图景，风俗人情，共同度过一个充满“京味儿”的新春佳节。

剧中，老舍在舞台上穿梭，以旁观者和讲述人的形式串联起清末的京城众生。这样的舞台表现是要突出老舍的“参与感”与“在场感”。“我想老舍先生在写这部戏的时候，他一定是参与进去的，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们希望老舍先生在舞台上用情感在跟剧中人物交流，某一个瞬间，他在俯视当时的一切。”导演冯远征表示。

作品以老舍先生的第一视角来进行叙述，将自己出生前后，清末的北京城生活风貌进行了刻画，以群像的方式讲述了百年前的民族命运。二度创作中，导演冯远征、闫锐以尊重原作精神内核，突出人文关怀为重点，给予作品更现代的演绎。冯远征说，“要有古典和现代相结合的审美风格。”虽然是一部京味儿戏，但舞台上不见传统的四合院等元素，而是一眼看到充满象征意味的红色屋顶等流动装置，演员表演也打破传统的空间限制，产生多维度的对话。这样的舞台呈现，让观众对京味儿戏有了新的观演感受。

今年的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从《龙须沟》到《茶馆》，从《骆驼祥子》到《正红旗》，老舍的作品伴随北京人艺一路走来。冯远征表示：北京人艺在这个时间上演《正红旗》，是曾被称为“郭老曹”剧团的北京人艺对这位文学巨匠的礼赞与致敬。

侯军：重读孙犁 追忆孙犁

本报记者 郭海瑾

日前，由北京万圣书园主办，天津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我见，作为一种书写的方法——《我观现代文坛》《报人孙犁》图书分享会”在北京万圣书园举办。分享会上，《报人孙犁》作者、《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原《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侯军动情地追述了他与孙犁在工作、生活中的缘分和故事。

在谈及当代青年人如何书写个人经历时，侯军认为，在任何时候进行写作，既要做到史料与观点相统一，又当时刻怀抱理想主义的追求，要对时代的问题、现实的生活有所回应，不能让写作沦为纯粹逐利的工具。

《报人孙犁：重读孙犁随笔》是侯军追忆孙犁的随笔之作。作者重读孙犁的报人文字、新闻作品，结合自己与孙犁的往来旧事，将30多年前与孙犁的承诺落笔成卷，侧写出孙犁不为人们熟知的报人形象，让“我见”成了一种阐释的可能。

“这些作品都向我们展现了生命化的书写方法。让我们看到，研究或写作的对象不再是与创作者无关的、停留在文本的客体，而是与创作者的人生、历史勾连起来，形成了生命之间的互文。”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康这样评价。

刘庆邦：挑起“花灯”迎新春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力作《花灯调》，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花灯调》聚焦贵州偏远山区的贫困村——高远村，这里是“高原孤岛”般的存在，百姓过着“刀耕火种”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年复一年。在地理条件恶劣、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等自然与人文双重短板的背景下，高远村接受了来自城里“白天鹅”的“魔法”，在她的感染带动下播下希望的火种，命运的齿轮从此开始转动……

作品原名《泪为谁流》，说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自况。这泪水为千千万万曾在贫穷困顿中挣扎的同胞而流，为同样数量庞大的心想要改变农村、农民困落后现状的好干部而流，为乡村振兴事业取得的成绩而流，为国家心系每一处、每一人而流……

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刘庆邦也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正因如此，他对乡村振兴才有着格外的期待，深知其成果的来之不易。在70岁的高龄投入《花灯调》这样长篇小说的创作，刘庆邦不仅付出了脑力、体力的代价，也情不自禁地投入了丰沛的情感。写作时他常常会被书中的人物故事感动得泪眼婆娑，他感叹：“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肖复兴：唤醒远逝的童年时光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作家肖复兴新作《风啊吹向我们》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小说以作者自身的成长故事为蓝本，写出了普通孩子成长的喜悦与悲欢、少年成长的疑惑与困惑。故事情节平实朴素，有童趣接地气，既符合当年那个少年时代的样子，也能和今天的少年朋友心意相通。肖复兴说：“这本书中的人物，都和我密切相关，重叠着我自己生活中的浓重影子。这在我写过的几本儿童小说中绝无仅有，恐怕以后也难以再如此密集出现。我把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最富于诗意的想象，最充满憧憬的寄托，都写在这本小书里了。”

这本书在童年生命感受的诗化表达、童年人生况味的审美理解、童年体验之于人生价值的反思力度上均有突破。肖复兴表示，“书中写的是我自己少年的经历。事过经年之后的回忆，不是打开一本老相册，翻看那些发黄的老照片，重温依稀旧梦，它需要的不仅是昔日人物情景的重现，更是细节的丰盈、想象的弥合，对远逝时光的重新唤醒、诗意的理解，以及能够与今天生活现实相关联的一些新鲜的认知。”近年来肖复兴持续推出《红脸儿》《合欢》《兄弟俩》《春雪》《水上花》等儿童文学作品。《风啊吹向我们》聚焦少年友情之成长达成的命题，是一部将成长书写的复杂性、与纯净度兼容的作品。

学海星光

留存时代记忆，赓续民族精神

全国政协委员 杨红林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在新时代，各级各类博物馆作为收藏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机构，要更好珍藏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引导人民群众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因此，文博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面对复杂形势与挑战，主动作为，加快构建能够充分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革命文物收藏体系。



国博征集工作人员查看三线建设时期使用的生产设备

自觉履行博物馆留存时代记忆的职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加强对革命文物藏品的保护，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赓续民族精神，无疑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责。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博物馆工作者就提出要征集、保护包括反映居民生活变迁的实物资料。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博物馆界普遍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即重视古代文物轻视近现代文物，甚至认为近现代当代历史物证不算文物。随着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反映近现代甚至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实物和资料开始受到重视，迅

速成为博物馆的征集对象，科技、现当代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也受到关注。因此，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大力开展革命文物藏品的征集，正成为许多博物馆的共识。一些博物馆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也应该看到，革命文物藏品征集工作也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收藏尚不够丰富，反映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文物普遍收藏较少，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物收藏更少。这不仅难以全面反映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也导致许多博物馆、纪念馆的陈列展览缺乏珍贵实物的支撑，往往以相互雷同、重复的照片、复制品填充版面，达不到应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生活和物质条件迅猛改善，各类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加速消亡，抢救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拥有143万余件藏品，其中革命文物即达30余万件。其中既有最早出版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就义绞刑架、淮海战役中董力生用的独轮车等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的重要物证，也有开国大典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鞍钢职工献给毛主席的一段我国自制的最后一根无缝钢管、邓稼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用的计算机、小岗村“十八枚红手印”、世界贸易组织宣布中国入世的木槌、神舟五号返回舱等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代表性物证，更有近年来最新征集入藏的天津滨海新区109枚公章、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钟南山院士新冠疫情初期奔赴武汉时的无座高铁票等反映新时代伟大历史成就的实物见证。这些代表性物证的

不断征集入藏，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艰难探索、新时代的砥砺前行提供了生动载体。

积极拓展革命文物藏品征集新空间

博物馆作为收藏国家历史、保存文化基因、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机构，一定要克服厚古薄今、忽略当下的误区，一定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为历史而收藏，为明天而收藏。文物藏品征集工作者，必须有敏锐的意识，有预见性地赋予当代物证以历史价值，及时跟进收藏。2020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专门就博物馆征集体系建设提出要求：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军事系列文物征集，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开展科技、现当代艺术、传统工艺、生态保护、工业农业生产等专题收藏，探索反映世界多元文化的收藏方向。因此，新时代的博物馆必须及时转变思路，进一步扩大博物馆收藏范围，避免过分看重兼具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物藏品，应兼顾能够体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见证物，大力发掘现代藏品的时代价值、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近年来，国家博物馆大力开展国家文物抢救工程、时代物证进国博行动、记忆中国行动等征集专项，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博物馆藏品征集的积极性，大量征集反映百姓生活变迁、城乡建设、非遗传承等方面的藏品，取得了显著成效。

面对新时代的伟大图景，博物馆应肩负起时代记忆的责任，大力开展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相关实物的收藏，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